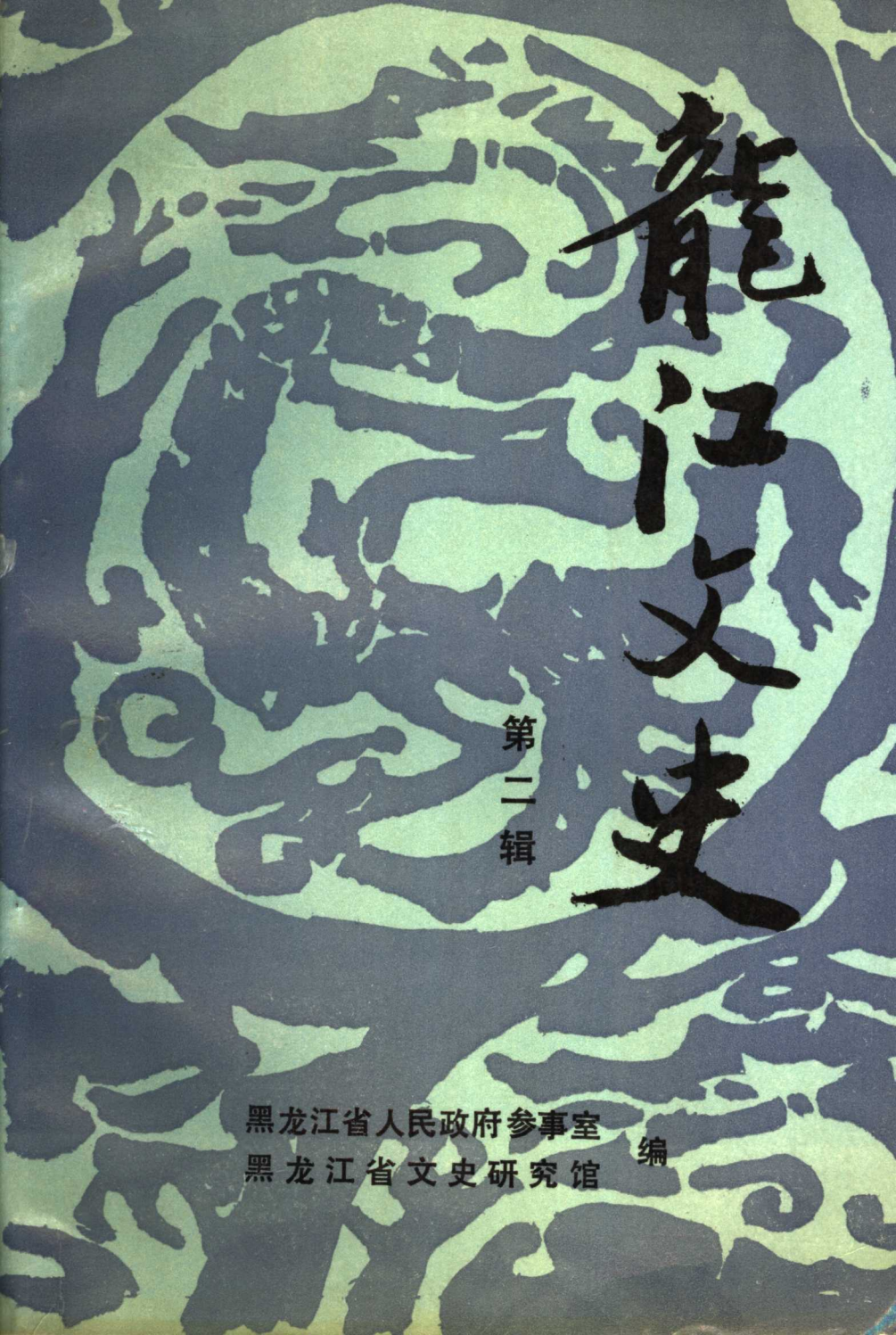




# 龍江文史

第二輯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室 编  
黑龙江省文史研究馆

# 龙江文史

第二辑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室  
黑龙江省文史研究馆

编

1991 • 9

主 编：张淑媛

责任编辑：杨治兴

编 辑：王 竞 柳彦章

卢成梁 赵江平

封面设计：李士学

## 龙 江 文 史

### 第 二 辑

---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室 编  
黑龙江省文史研究馆  
(哈尔滨市吉林街60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大 32 开 · 7 · 印张 2000 · 印数

---

黑新出图(1991) 204 号内部发行  
工本费：2.80 元

## 目 录

我与王岗事件 ..... 张瑞麟 (1)

完达一青松

——记抗联第七军军长李学福 ..... 原子明 (7)

记王震东烈士 ..... 王宏伟 王泽林 周淑珍 (19)

我所知道的徐靖远 ..... 黄宇宙 (29)

受到列宁三次接见的刘泽荣 ..... 张福山 (35)

蒋介石怎样迫使龙云下台的 ..... 张第东 (44)

忆王克俊将军 ..... 吴泽炫 (54)

清季黑龙江将军程德全 ..... 张 超 谭彦翹 (57)

清末黑龙江的三位教育家

——林传甲 刘璿 祝宗梁 ..... 王洪生 王延华 (67)

中俄经济关系与尼布楚条约 ..... 李济棠 张毓诗 (76)

《满洲里界约》之形成及其前因后果初探

..... 吴铁英 魏正一 (93)

沙俄对华领土侵略记略 ..... 张寰海 温汉惠 (103)

言《易》 ..... 高式国 (113)

读《易》笔记 ..... 边健如 (116)

海外《易》学研究掠影 ..... 李兴国 (126)

璵璠魁星阁 ..... 刘邦厚 (133)

|                       |               |
|-----------------------|---------------|
| 马占山毁家纾难·····          | 王曦亮 (135)     |
| 哈埠八景与遼园·····          | 马维权 (137)     |
| 张朝墉取号“半园”的由来·····     | 张 超 (139)     |
| 成多禄的蕉叶书·····          | 谭彦翹 (140)     |
| 两方独具一格的名号印·····       | 王 竞 (142)     |
| “一毛钱饭馆”·····          | 支 援 (143)     |
| 英和《卜魁集》诗选·····        | 黄定天 李兴盛 (145) |
| 试论地志博物馆·····          | 柳彦章 (159)     |
| 黑龙江地名中的历史因素·····      | 高思林 (166)     |
| 黑龙江锡伯族考述(下)·····      | 于世春 吴克尧 (174) |
| 《辞源》辰集注释商榷(下)         |               |
| ——《辞源》《考订》续篇之十二 ····· | 田忠侠 (181)     |
| 对《卜奎掌故五则》一文的几点质疑····· | 张 琳 (213)     |
| 明刻善本《真珠船》简介·····      | 何俊芳 (216)     |

# 我与王岗事件

张瑞麟

伪满哈尔滨市王岗第三航空队的武装起义，不是自发的起义，是在党的东北抗联第三路军十二支队和我亲自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举行的一次武装起义。它是东北抗联史上的一次伟大壮举，震动了东亚和东欧一些国家，日本、苏联报纸均有报导，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在东北的统治。

1936年根据中共远东局的决定，撤销中共满洲省委，成立东北地市地下党特委，领导东北城市地下党的工作。中共远东局派韩守魁同志为特委书记，我任特委组织部长兼中共哈市地下党市委书记。

1937年4月15日（即4、15事件），哈尔滨市地下党组织遭到了敌人的破坏，我和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这时，我一边发展地下党支部，一边寻找党的组织。1940年3月，听说在江北肇东地区有一支名叫“庄稼人”部队有抗日活动，估计可能有党的领导，我便与地下交通员常佐臣同志先找到了他的盟兄弟王庆发，（住肇东县靠江沿小薄家围子）后又通过王庆发找到他们屯的刘老二。再托刘老二找到了已去“庄稼人”部队的弟弟——刘老三，名叫刘胜武。由刘胜武领着我们到肇东靠江沿的小岛子树林子里，才算找到了“庄稼人”部队。经了解，他们不是什么抗日队伍，而是一小股土匪。原来这支队伍的前身是“9·18”事变后东

北伪军组成的抗日义勇军。由于马占山、丁超、李杜、苏炳文、李海青等人进关后，留下的一少部分军队，解散回家。这些人在家也呆不消停，因为伪满特务警察经常到他们这些人家去搜查，管他们要枪、要炮的。迫使他们不得不铤而走险，逼上梁山，又结帮成伙地来“吃打饭”了。所谓“吃打饭”是土匪的一句黑话，意思是用抢劫行动搜取财物，维持生存。来到这里之后，他们的大小头目对我和常佐臣同志进行了一连串的了解和考验，才放心了。我想既然来到这龙潭虎穴，就要弄个水落石出，主动做他们的工作，使他们能改邪归正，一起抗日救国。

这支匪队有四五十人，其中有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名叫刘鹏飞，原名刘远泰。他年轻，有文化，我们就有意地和他接近、交谈、了解。这才知道他原来是被征当“国兵”的，后来把他派到日伪第三航空队，当了一名中士。于是，我就想到，如果能把这个日伪第三航空队的武装起义发动、组织起来，那该多有意义啊！所以，便在普遍联系团结众匪成员的情况下，特别与他相处关系很好。据他说，这航空队里的士兵们亲眼看到日寇的残酷行径，敢怒不敢言，恨之入骨，使他们在心里埋下了反满抗日的火种，大部分士兵是“身在国兵营，心想打日伪”。他又说到自己是1940元旦回家探亲，因妻子生孩子而误了归期，部队派人把他抓回，归途中，他想回去也没好，要受酷刑。于是便借押送人的不备之机，逃跑了。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投奔了这个“庄稼人”部队。他还说：“我们在伪满第三航空队的中国士兵很受气，不但吃不饱，而且经常遭到日伪官兵的打骂，他们对日寇统治很不满，反满抗日情绪很强烈，一触即发。”于是我就经常做刘鹏飞的政治思想工作，他的政治觉悟提高的很快，思想也很坚定，我就准备在适当时机把他派回去，发动伪满第三航空队的武装起义。

1940年农历9月间，我和三路军十二支队取上了联系，找到

了党的组织。组织上把我安排在十二支队三十六大队活动。在肇源战斗结束之后，又安排我任十二支队政治部主任兼宣传委员。不久，又经过我们十二支队领导的努力，把“庄稼人”部队改编为抗联十二支队独立大队，领导上考虑到我对该部队人员的思想情况比较熟悉。要我兼任该大队的政治指导员。后来，我就把刘鹏飞引荐给十二支队领导，并介绍了伪满哈尔滨市王岗第三航空队的情况，提出争取他们起义的意见。经过十二支队领导研究，同意我的意见，并决定派刘鹏飞回哈市做策动伪满第三航空队的武装起义工作。刘鹏飞同志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在临行前，我嘱咐他回去后要找可靠人，搞好组织工作，我还把我在烟筒山伪五旅十四团迫击炮连做起义工作的经验介绍给他。十二支队的领导都很关心策动第三航空队起义的事，在当时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还给他带了两万元伪币作为起义的活动费。从此，他就踏上了民族抗日的革命征程。

同年12月，刘鹏飞带着历史的重任回到哈市后，很快就和他在第三航空队中的好朋友班长苏贵祥、唐天赐、计允库接上了头。向他们介绍了他已经参加抗日联军第十二支队，宣传了抗日救国的道理，还讲述了抗联十二支队的意见。刘说：“我在外边周旋了好几个月，后来跑到江北‘庄稼人’队伍里，在那里，认识一位抗联的领导人张瑞麟。他经常给我们讲抗联打日本鬼子的道理。劝我们不能吃打饭。他叫我要爱国，打鬼子，我们都贫苦人，不能叫鬼子任意奴役呢！我这次回来就是受抗联第十二支队的委托，做第三航空队起义工作的。我们想想，抗日联军也是中国人，人家打日本鬼子不怕牺牲一切，为的是解放中华民族；我们也是中国人，怎么能给日本鬼子卖命呢？”他鼓动大家：“不能再当亡国奴了，参加抗联，一起打鬼子。”苏贵祥等人早就恨透了日本鬼子的统治、压迫，一听刘鹏飞的这些话，很是振奋。苏贵祥的哥哥

曾被日寇杀害，为兄报仇的怒火，早就在他脑中燃烧。刘的一席话如同火上浇油，和大家的思想一拍即合。苏贵祥等一致表示：我们干了，一定积极作士兵工作，争取早日起义，投奔抗联打鬼子。接着，刘鹏飞同苏贵祥等人对于怎样作士兵工作，对武器库、被服库、机场等重要部位怎样处置，起义之后的路线等都做了细致的考虑和安排。当苏贵祥、唐天赐、计允库、张贵州等人回到第三航空队后，分别秘密串联一些志同道合的士兵，并把刘鹏飞传达抗联十二支队让第三航空队起义的意见告诉了他们。都表示坚决支持和响应。准备工作进展得很顺利。

为了使这次武装起义万无一失，在12月29日，刘鹏飞、苏贵祥、唐天赐、栾金成、谢俊岭、高振山、周祥春、张贵州等人，在第三航空队飞机场西边杜家屯谢俊岭家召开了秘密会议，研究起义事宜。为争取时间，不被日伪敌人发觉，决定在新年假期日本人和伪军官回哈市内度假的机会，举行武装起义。

起义计划定好之后，刘鹏飞曾多次去与十二支队联系，但因十二支队与日伪军讨伐队周旋作战，驻地不定，刘鹏飞没有同我们联系上。后来，刘鹏飞写了一封汇报材料和请示信，托他的一位亲戚带着去找我们，送信人找了好几天才找到我们。我看完后，就和十二支队领导研究，一致认为，现在正是一年中最冷的季节，积雪很厚，行军极不方便，日寇关东军讨伐活动又十分猖獗，我们无法向哈市靠近接应起义军。我把十二支队的意见告诉了送信人，让他速转刘鹏飞，起义不要操之过急，条件成熟后，待青纱帐季节再行动，也便于接应。可是，没等送信人回去，飞行队已于1941年1月4日夜里举行了武装起义。刘鹏飞这时已不在哈尔滨去他叔叔家了。

伪满哈尔滨市王岗第三航空队武装起义的枪声打响之后，为了投奔抗联十二支队，直奔“三肇”而来。可是，这时十二支队已不

在“三肇”地区了。因为我们当时受抗联三路军总部的指示，打开肇源以后，接着又打开了头台镇、二站、新站、古龙站镇、孙玉、保树镇等城镇对哈市的日伪统治已构成了强大的威胁。所以日伪统治者便派大批蒙古骑兵和用数百辆汽车拉来的日伪军队，兵分几路向我十二支队进行围剿，想一下子把我们消灭在“三肇”地区。在这种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我们被迫撤回庆安、铁力两县的南山里，所以我们没有和起义队伍接上头，使起义队伍处于孤军作战。在起义者在拉出队伍，杀伤了大量前来追歼、围剿的日伪军之后，许多起义者都壮烈地牺牲了。据说，苏贵祥身负重伤，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深知没有完成历史的使命，用颤抖的手从衣兜里掏出给抗联十二支队带的有关文件和参加起义人员的名单，怕落到敌人手中，他点燃烧毁了。并对同志们说：“我们伤亡很大，我也不行了，你们尽力往外冲吧，出去后，一定找抗联十二支队张瑞麟同志。等把日本鬼子打出中国去时，中国解放了，你们和政府说，给这次牺牲的同志修个纪念碑，让他们知道我们是打日本鬼子死的。快，快冲出去吧，别——管——我……”。还有大部分起义者都被打伤或被俘，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起义就这样的失败了。后来，哈尔滨日本宪兵队立即赶到肇东，对被俘的起义者进行审讯，接着又在作战地区和附近的肇州、昌五、四站等地，继续搜捕突围的起义者。1月10日，将那些被俘的起义人员押回哈尔滨，关在日本宪兵队道里分队进行审讯。2月中旬，又将他们转到第四宪兵团，追问这次起义是谁策动的，是谁领导的。不屈的起义者们严正地回答敌人：“是抗日联军策动的，是抗日联军领导的！”于是凶狠的敌人对他们施尽各种酷刑。第四宪兵团又组成特别搜查队，到“三肇”地区搜捕刘鹏飞等人。于1月24日将刘鹏飞在安达县萨尔图他叔叔刘长胜家逮捕押回哈尔滨。

刘鹏飞押回哈尔滨和起义者巩振生关押在同一牢房里，尽管

敌人对刘鹏飞施行酷刑，打的他遍体鳞伤，死去活来，但始终他坚贞不屈，与敌人展开英勇的斗争。6月中旬，将全部受审人员移交伪满第四军管区法庭审判。7月中旬，伪满第四军管区法庭以叛乱罪判处刘鹏飞、史登云、唐天赐、陈裕民、周祥春、谢俊岭、高振山、金钟正等8人死刑。日寇宣布刘鹏飞等所谓罪行时说：“经查，这次叛乱是共匪抗联十二支队有组织、有计划策划的，是叛乱头子刘鹏飞、苏贵祥、龙兴国、史登云、唐天赐、谢俊岭等领导、指挥的。打死日军、满军370余人，罪恶累累。为铲除匪奸，军法庭判处他们死刑。”在第四军管区（现哈市三中址）临上刑场前，刘鹏飞冲破敌人的阻挠，愤怒地说：“日本鬼子，你们的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你们是屠杀中国人民的最凶恶的敌人，你们才是罪恶累累。今天你们杀了我们几个人，杀不尽中国人民，中国人民不会饶恕你们的，抗日联军一定把你们打败，一定会把你们赶出中国去的！”日寇拿着被布用枪嘴子把刘的嘴堵住，在日寇忠灵塔（现在的省体场的跳伞塔）前把刘鹏飞等8人枪杀了。有的叛了无期和有期徒刑。目前，起义者尚存的还有张贵州、巩振生、吴海峰、严玉山、戴英奎、王玉琪等人。

我非常怀念这些当年的起义人员，一想起他们，我就难过。他们当时那么年轻，那么健壮勇敢，他们热爱自己的祖国，痛恨敌人，他们的爱国激情、民族革命精神是永存的！是值得我们永远缅怀和学习的。

（于林涌整理）

# 完达一青松

## ——记抗联第七军军长李学福

原子明

李学福，原名李学万，别名李葆满，朝鲜族人。1901年旧历12月11日生于吉林省延吉县山莱沟老虎屯。自幼家境贫苦。十二岁丧父，十五岁跟随母亲和兄长来到黑龙江省饶河县的大佳河，不久又迁到三义屯居住。

三义屯位于乌苏里江支流大带河的南岸，是这一代较大的屯落。李学福全家三口，主要靠哥哥开荒种地为生，生活很困难。李学福自幼酷爱读书，喜交友，有抱负。在读书时就产生了抗日救国思想。母亲去世后，李学福家境更加贫困。李学福到饶河县城保卫团当了兵。这期间他广交朋友。但不久他就感到，保卫团内很腐败，官员只知捞钱，欺压百姓，搜刮民财，于是便离开保卫团回到了三义屯。由于李学福胆子大，见识广，肯帮助人，乡亲们都很敬重他。

### 初遇险，智勇脱虎口

1929年，中共满洲省委派崔石泉（崔镛健）、黄继兴等同志先后来到黑龙江省的宝清、饶河等地开展抗日活动，组织青年训练班，成立“反日会”，印发传单，揭露日本侵略朝鲜和中国的罪行。这些对一向关心政治、肯为穷人出力办事的李学福，产生了深刻

的影响。很快，他就与崔石泉等人联系上了。他热情为崔石泉等人介绍当地民情风俗、思想状况、各界人士的特点等等；崔石泉经常向李学福讲穷苦人如何求解放，如何反对日本的侵略扩张、两人很快就成为密友。李学福积极参加反日活动，在各方面支持崔石泉，三义屯逐渐成为饶河一带开展抗日活动的联络中心。

“九一八”事变后，在共产党组织领导下，饶河一带反满抗日的革命斗争形势日益高涨，李学福被推选为饶河反日会的负责人之一。他在群众中积极宣传团结起来抗日救国的道理。在李学福等人的宣传和组织领导下，三义屯群众于1932年2月公开举行了反日集会，会后，数百人跋涉数十里拥进饶河县城，举行反日示威游行，轰动全城。这次示威游行，对三江一带的反日斗争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32年夏，日寇占领松花江下游之后，严密控制水路运输，对乌苏里江下游进行经济封锁。主要靠水路运输与外界交往的抚远、饶河一带出现了商船停运、商人不赊账、群众得不到生活必需品的局面。秋季又发生严重水灾，粮食奇缺，价格暴涨，人民生活更加困难，群众反日情绪也随着更加高涨。在反日会领导人李学福、李阳春等人组织领导下，先后在暴马顶子、关门咀子、大岱河等十余个地区发展了反日会员，成立了反日分会组织。反日斗争在饶河一带迅速开展起来。

在党组织培养教育下，李学福政治上越来越成熟，在群众中的声望也越来越高。自然也就越来越被反动势力所嫉恨。

三义屯的春天是美丽的。野外山峦青翠，百花盛开。李学福和崔石泉慢步在屯边的小路上，商谈如何扩大工农抗日武装。如何办骨干训练班，如何筹集给养等。

正当这春暖花开的时候，救国军首领高玉山率军四千余人打开饶河县城，成为这一带的主要武装力量。但这支队伍纪律松

弛，矛盾复杂，有时为争夺势力范围而互相冲突。在这种形势下，崔石泉等人刚刚组织起来的工农义务军，如何保存队伍继续发展，并团结各种抗日武装力量共同抗日便成为急待解决的严峻问题。特别是对救国军，如不善于处理互相之间的关系，不仅难于保存自己，甚至部队给养都难以解决。这时共产党饶河中心县委开会决定与救国军联合抗日，并派李学福前往救国军总部谈判。这是一个极其复杂而困难的任务，处理不好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李学福不畏艰险，勇敢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他立即从饶河动身前往虎林独木河一带寻找救国军总部。他来到独木河，但没有直接去找救国军司令高玉山，而是先设法找到了救国军第一旅参谋长王惠卿。王惠卿是个热心抗日的人，文武双全，深受高玉山和第一旅旅长孙宝鼎的赏识和器重。特别是孙宝鼎，对王惠卿简直到了言听计从、百依百顺的程度。救国军占领饶河县城后，王惠卿就积极支持当地反日会的工作。身为反日会负责人的李学福就经常与他打交道，两人关系相处得十分亲密。因此李学福先找到了王惠卿，两人相见互诉衷肠，越谈越投机。王惠卿关切地问饶河地区反日斗争情况。李学福谦逊地向王惠卿谈到了饶河地区反日斗争形势大好，群众热情高，对救国军很敬仰。王惠卿听了，十分高兴。谈到工农义勇军，李学福陈述利害关系后，谈了希望与救国军联合抗日的想法。他说：“工农义勇军成立半年来已有很大发展，大伙抗日决心大，士气高。大敌当前，各种抗日力量必须联合。大家都很仰慕救国军，尤其愿在王参谋长的直接领导下共同抗日。”王惠卿当即表示：“抗日大业乃大家的事，只要大家愿来，非常欢迎！”李学福接着补充说：“只有一个请求，因队里成员均是朝鲜族，希望暂时不要打乱建制。”王惠卿满口答应说：“那是当然！那是当然！”自此，饶河工农义勇军即改编为东北国民

救国军第一旅特务营，为后来发展壮大创造了条件。

从此，李学福在虎饶一带成为敌友我三方注意的中心人物。

1933年8月，日寇占领饶河县城，亲日势力顿时活跃起来。日军利用汉奸苑福堂、龚金城秘密逮捕了李学福、黄继兴等20余名共产党员和反日会员。李学福在被关押期间与敌人进行了坚决斗争，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真实身份。但是汉奸苑福堂和龚金城为了效忠日本主子，还是决定处死李学福和黄继兴。一天傍晚，俩人被捆绑起来，由数名士兵押往饶河城外。在途中，李学福示意黄继兴寻机脱离虎口。

太阳西沉，天色越来越暗，离城也越来越远了。在押送的士兵中，有一名是李学福的朋友，他暗示李学福伺机逃走。当走到一个偏僻的地方时，李学福突然挣脱绳子拔腿就跑。跳到附近一个水泡子里，急中生智，顺手抓了漂在水面的一捆马草顶在头上，潜入水中，巧计脱险。伪军赶来四处搜寻不见踪影，只好乱放了一阵枪空手而归。从此，饶河一代流传开“一束马草救英雄”的故事。

### 完达山，葆满抗日队

俗语说：“大难不死，必有重任”。李学福逃出虎口之后，饶河中心县委认为，他的身份已经暴露，不便于再在地方工作，决定让他到游击队去工作。到游击队后，最初他担任军需长，为部队筹集给养。1934年2月，党组织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将特务营改编为饶河民众反日游击队，李学福担任队长，崔石泉任参谋长，朴振宇任政治委员。

李学福担任饶河民众反日游击队长职务后，根据饶河中心县委的指示，认真执行党的抗日武装统一战线政策，广泛联系汉族和朝鲜族群众，结合本地季节特点，积极、主动、灵活多样地开

展武装斗争，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敌人的讨伐，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在人民群众中的声望越来越高。群众亲切地称游击队是“虎饶葆满队”。

这年冬天，饶河一带普降大雪，山区交通断绝，平地雪深过膝。敌人妄图利用大雪封山的机会，将我游击队一网打尽。

为了粉碎敌人的讨伐，李学福挑选年轻力壮的队员组成滑雪队，苦练滑雪技术。李学福冒着严寒亲自组织训练。他鼓动队员们说：“敌人妄图利用大雪来困死我们，而我们却要利用大雪来消灭他们。大家学会了滑雪，就好像蛟龙得水，猛虎添翼，胜利一定是我们的！”队员们很受鼓舞，训练热情十分高涨。没有器具自己做，不会滑雪就一遍又一遍地练。摔跤的，撞树的，翻筋斗的都有，但大家从不叫苦。跌倒了就爬起来，撞在树上就咬咬牙，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难，一直不停地坚持练。不多时日，大家就能在雪地上“自由飞翔了”。一声令下，犹如一叶轻舟在水面飞驰，一溜烟就出去十多里远。

对敌人的冬季大讨伐，李学福采取避开与敌正面交手，抓住有利时机出击，敌人集中，我军分散，敌人分散，我军集中的战术来打击敌人。在反讨伐中，李学福培训的滑雪队发挥了特殊作用。他们来无影，去无踪，翻山越岭，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寝食不安。

1934年2月中旬，饶河200多名日伪军乘坐20多套马爬犁进犯“18垅地”。这里是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山沟。东北两面是大山，西面是较矮的山岗，只有一条南北向的道路通往住户人家。路两旁和住户附近是一片烟田平地。整个地形犹如一个圈椅。在积雪过膝的情况下，敌人只有通过此路才能进入该屯。李学福得悉情报后率领滑雪队迅速占领有利地势，筑起雪壕待敌。上午九点多钟敌人果然前来进犯，在离屯三四百米处下了爬犁，徒步前进。

当敌离屯一百多米时，游击队集中火力猛烈射击敌群，当即打死十余人。敌人还依仗人多势众，一次再次组织反扑，并妄图包剿我军侧翼。而李学福组织队员沉着应战，一次又一次击退敌人的进攻。待大量杀伤敌人之后，李学福一声令下，队员们登上滑雪板，转眼间一溜烟翻过山岗消失得无影无踪。敌人无可奈何，只好拖着数十具尸体沮丧而归。

草木生长，百花盛开的季节又到了。游击队在李学福领导下不仅未被消灭，反而日益发展壮大，并逐步建立了以“暴马顶子”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

1935年1月中旬，敌人从佳木斯等地调集了800余名日军精锐步兵和骑兵大举“讨伐”我游击根据地。李学福把分散作战的游击队员集中于“大旺砬子”一带，在敌必经之路设伏，并派几十名滑雪队员选择地势险要、积雪较深、不易被敌发现的地方待机，准备奇袭。

不出三天，敌大队人马果然往“大旺砬子”进发。前面骑兵开路，后面步兵乘坐马爬犁跟随前进，犹如一条长蛇在深山密林中匍匐前进。越走山势越险峻，敌人正迟疑之际，突然发现前面有人影移动。便开枪射击。这几个人边还击边退却。敌骑兵扬鞭跃马疾驰而进，但人已进入树林丛中不知去向。正在这时，我军伏兵一齐射击，十余骑兵应声落马。敌队只听枪响，不见人影，顿时惶乱起来。步骑混杂直在原地打转。这时我军火力更加猛烈射击，毙伤之敌甚众。直至天色渐暗，敌人进退两难时，我滑雪队员勇猛飞速冲向敌群，枪击刀砍，纵横穿梭，反复冲杀。战斗持续了近一天，毙伤敌军百余名，缴获部分枪支弹药。我军伤亡6人。敌余兵，有的狼狈逃窜，有的冻死冻伤在深山雪地。

大旺砬子伏击战胜利结束后，李学福便于2月初乘胜率队夜袭了“暴马顶子”敌军。这里原本是游击队的根据地。敌人在大讨伐